
宋辽金文学与中华文学一体化

胡传志

宋辽金是中华文学由中古向近古发展的特殊时期。北宋统一中原之时，北方已经有了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，占据包括燕云十六州这些汉唐故地在内的大片土地，与北宋王朝相邻相对，长达一百六十年。后来，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建立金王朝，成功入主中原，又与南宋相邻相对一百一十年。宋辽金三代文学，既相对独立，各有一定的个性，又紧密相连，逐渐趋同融合，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学的演进和发展。

从理论上来说，宋辽金三代文学与中华文学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，整体是部分的有机结合，但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。怎样有机结合，是能否构成一体的关键所在。处于中原边缘的辽金文学具有中华文学的因子，具有与中华文学相融合的基因，是宋辽金文学貌离神合、进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。

辽代统治的疆域非常广阔，核心区域远离中原，统治者以契丹族为主，有相当成熟的契丹语言和文字。辽灭亡六十多年之后，金世宗还说，“契丹文字年远，观其所撰诗，义理深微”（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4册，第1141页）。辽灭亡百年左右，元好问还见过三百年前耶律倍用契丹小字所写的诗歌，“意气曾看小字诗”（《元好问诗编年校注》卷五《东丹骑射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3册，第1101页）。耶律倍的七世孙耶律履及其子耶律楚材还懂得契丹语言文字，可惜辽王朝的契丹语文学作品早已失传。所幸寺公大师的契丹语长诗《醉义歌》由耶律楚材将之翻译成汉语，完好地流传后世。该诗汉译本为七言古诗，长达一百二十句，其篇幅超过了杜甫《北征》，等同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，足以见出契丹语言文字能够自如地抒情言志。耐人寻味的是，这首契丹语诗歌居然化用了孔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庄子、白居易、梁冀等人相关典故，写到泰山等中原地名，说明它原本就具有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，体现出与中原传统汉语文学的亲缘关系。契丹语诗歌如此，辽王朝的那些汉语文学更是先天性地带有中华文化的基因，不可避免地受到此前汉语文学的沾溉，同时还受到与之相邻的北宋文学忽明忽暗的滋养。譬如辽圣宗喜欢白居易诗歌，既与白居易晚唐以来“广大教化主”的崇高地位直接相关，又与北宋早期白体诗风盛行差不多同步，二者声息相通。又如耶律乙辛等人陷害辽道宗皇后萧观音，将写男女私情的《十香词》嫁名于北宋某皇后，萧观音轻易上当，将之书写下来，这说明辽人的《十香词》足以阑入北宋作品之中。

金王朝先后占领部分辽宋国土，在辽宋故土发展新兴的女真文化，基础薄弱。他们创制的女真文字尚不及契丹文字成熟，更遑论汉字了。金世宗不得不承认“女直字创制日近，义理未如汉字深奥。”（《金史》卷五一《选举志》，第4册，第1141页）所以，女真语文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。金世宗自燕京返回上京时，有感于女真父老之情，曾亲自创作女真语歌词，动情演唱女真“本曲”，试图以此来加强本民族语言文化建设，后来金显宗、金章宗也努力挽救女真“本曲”，可惜收效甚微。从现存金世宗“本曲”以及完颜匡《睿宗功德歌》汉译本看，这些四言诗以歌颂金源祖先功德为主，下及当代史，风格接近《诗经》雅颂传统，不排除创作者和翻译者受到了《诗经》传统的影响，即便没有受到《诗经》传统的辐射，至少也与《诗经》传统同调，能与中华传统文学殊途同归。在女真语言

文学起步阶段，女真族就受到汉文化的强大感召，快速汉化。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在别人眼中已经“宛然一汉家少年子”（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六六引《金虏节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下册，第1197页），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更是毅然决然地将都城连同皇陵，从东北发祥地的上京（今哈尔滨阿城市）迁到汉族居住区的燕京（今北京），汉化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完颜亮、完颜璟等人汉语文学创作水平骤然提升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。完颜亮说“万古车书尽会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”（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卷二八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》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册，第356页），继承的是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，在他看来，只有一统天下，才能获得正统地位。完颜亮还能够跨越对立政权，称赞与他的部队激战而亡的南宋将领姚兴“一心忠孝为南朝”（祝诚《莲堂诗话》卷上引完颜亮《哀姚将军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），如此一来，在价值观层面，也已经接近中华传统文化。另一贵族完颜璟的诗词，代表了女真族文学的最高成就，在审美标准、艺术风格等方面，与其他汉族作家几无二致，这些都体现出与中华文学相通相融的大势。

在辽金王朝，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逐渐超过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化，获得优势地位，这样就有了与中原王朝“说一种话，写一种字，据同一的文化，行同一的伦理”（傅斯年《现实政治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69页）的基础，有了文学一体化的前提。那么，以正统自居的宋王朝如何对待相邻的辽金文学？是否具有与之相通、进而一体化的气度？

客观地说，宋王朝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焦虑、转变过程。宋王朝不仅没有了唐王朝“天可汗”那样的风光与地位，反而周边列强环绕，“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”（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九《太祖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1册，第205页）。因此，宋王朝在与辽金的交往中，不得不放弃万邦来朝的幻想，不得不放低姿态，在国书中称对方为“大契丹皇帝”（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中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45页）、“伯大金皇帝”（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五八，上册，第435页），甚至被迫纳岁币。这一转变推动了宋王朝与辽金王朝的平等交流，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一体化的建设。同时，从秦汉以来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开放、包容的传统，能够吸纳佛教等外来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化，这一开放特质不会因为政权对立而中断，更不会因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转移。所以，宋代文化仍然呈现出开放的态势。北宋与辽王朝外交来往频繁，边界图书贸易活跃，辽国使者入宋后，索要魏野的《草堂集》，宋真宗能慨允赠与。后来官方以泄露朝廷政治军事等事务为由，曾一度禁止图书交易，效果却微乎其微。民间契丹歌舞、女真歌舞更是别具特色，风靡南北，从汴京到临安，朝廷未予禁绝。东丹王耶律倍的绘画，传入中原，也得到了宋人的认可。辽道宗耶律洪基的《题李俨黄菊赋》入宋后，广受青睐。侵略者完颜亮固然激起南宋人强烈的民族仇恨，而他的那些充满个性的作品，不但没有被赶尽杀绝，反而被南宋人带着一半猎奇一半认可的复杂心理记载下来，完颜亮的作品最终主要靠南宋的记载而传世。对金王朝其他文人，宋王朝更加宽容，如毛麾、赵可、元好问等人的作品都得到了南宋人的认可。总体来看，来自敌对政权的辽金文学传入宋王朝后，没有遭到刻意歧视和抵制，与中原传统文学互鉴并存。

既然辽金文学趋同于宋代文学，宋代文学又能呈现出开放的态势，那么宋辽金文学就会形成一体化的格局。但在一体化的过程中，存在谁为正统这一突出问题。宋王朝占据核心地域，即使后来退居杭州，仍然当仁不让地以正统自居，但是，形势比人强，宋王朝在与辽、金平等交往的同时，事实上不得出让渡出一些正统观的话语权。欧阳修在《正统论》中将正统分为三类：居天下之正，合天下于一；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；虽不得其正，卒能合天下于一。宋王朝显然属于第二类，正而未统。而另一方金王朝则积极争夺正统，完颜亮侵略南宋，志在一统江山，夺得华夏正统，如他所说，“天下一家，然后可以为正统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九《李通传》，第8册，第2783页），正统似乎是比较南北统一更高的价值追求。后来的金世宗、金章宗没有再通过征战来实现华夏正统理想，但却通过制度建设、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实现了宇内小康的目标，取得了“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《章

宗本纪》，第1册，第285—286页）的政绩，完成了从边疆民族政权向中原华夏文明的蜕变，使得金王朝如同宋王朝一样，都是居其正而未能合天下为一。因此，金人也就有了挑战南宋正统地位的资本。理论上，赵秉文等人继承《春秋》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”（《赵秉文集》卷一四《蜀汉正名论》，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333页）的思想，为金王朝正统寻得理论依据，所以他们每每以“中国”“天朝”“皇华”“神州”之类自居，将新兴的北方民族蒙古人视为“胡虏”，甚至有人还反过来斥南宋为“蛮貊”“淮夷”。金王朝固然最终没有取代南宋成为唯一的正统代表者，但他们凭借实力与南宋平起平坐，跻身于正统之列。元人长时间反复争论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编纂义例，最后不得不将三者并列，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宋、辽、金各自正统的地位。金王朝的正统之争，表面上是针对南宋王朝的诉求，实际上双方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华夏正统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大一统的价值观。

与正统观转变相伴的是，宋辽金时期的华夷观也出现了新变。一方面，辽金北方民族统治者自觉华化，努力消弭华夷界限。辽道宗有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》诗，萧观音有《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》诗，体现出平等进步的民族观，金熙宗视女真贵族“无知夷狄”，自觉向华夏靠拢。另一方面，长期生活在契丹、女真政权下的民众，耳濡目染，受到不同程度的胡化，华夷之防日渐淡化。在下层，普通大众为了生存，难免如金世宗所说，“辽兵至则从辽，宋人至则从宋，本朝至则从本朝，其俗诡随”（《金史》卷八《世宗本纪》，第1册，第184页）。在士大夫阶层，他们逐步承认北方民族政权的合法性。如金代中期的萧贡将金王朝的作家队伍称作“国朝文派”（《中州集》卷一《蔡太常珪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上册，第33页），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，元好问又将之称为“唐宋文派”“中州文派”（《中州集》卷二《孙内翰九鼎》，上册，第75页），并认为得自“正传”，这就略过了女真王朝的民族属性，直承华夏正统。金亡之后的郝经更发出惊人论“今日能用士，而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也。”（《郝经集编年校笺》卷三七《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，下册，第991页）体现了不辨华夷的中国观。在传统观念看来，此论离经叛道，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那时还有很多南宋士大夫依然恪守君臣大义、华夷之防，宁死也不屈从、不认可蒙古政权。但是，随着蒙古政权的崛起，一统天下，更多的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接受这种观念，北方人的民族观念动摇了传统的华夷观。南宋遗民家铉翁认识到形势的巨变，评价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《中州集》，对其书名“中州”以及收录“南冠”诸人的体例大加赞赏，认为“壤地有南北，而人物无南北，道统文脉无南北”（《中州集》附录《题中州诗集后》，下册，第572页）。家铉翁将道统、文脉置于南北地域、民族、政权之上，实际上进一步弱化了华夷界限。这种观念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一体化发展，推进民族平等，维护民族团结，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，进而推动民族间的深度融合，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。后来的元明清三代，都是江山一统、文化一体的政权。

在追求正统、弱化华夷之防的背景下，辽金文学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。前云金王朝的“唐宋文派”，从名称上就体现出与唐宋的渊源。苏轼以及元祐诸人的学术与文学，在北方无所禁忌，盛行不衰，有学者指出，不仅“苏学盛于北”（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卷五，郭绍虞编选，富寿荪校点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3册，第1446页），其时程学亦盛行于北方，到了金代中后期，宋代的学术文化几乎无处不在。只要翻阅王若虚的《滹南遗老集》，就能发现，两宋的理学、史学、文学都为金人广泛关注。王若虚的各种“辨惑”，看似商榷，实是由爱而生，如柳宗元好读《国语》而作《非国语》一样。李纯甫的《鸣道集说》与此类似，针对宋人《诸儒鸣道集》的排佛立场而发，反驳周敦颐等宋儒之说，力图维护佛教的地位。其他如元好问受洪迈《夷坚志》影响作《续夷坚志》，王若虚受宋人诗话启发而作《滹南诗话》。不仅汉族士大夫这样，女真族亦是如此。金代科举设立女真科，科举考题主要来源于“五经三史”，特别是《汉书》，因为《汉书》很早就被译成女真文字，作为女真国子学的教材。不懂汉语的女真人可以通过女真文字学习接受汉文化，掌

握汉语之后，有的女真贵族酷爱汉文化，如贵族完颜璫喜爱《资治通鉴》，读了三十余遍。中华文化深入人心，所以尽管天下没有一统，文化上却维系着一统。

当然，在中华文学一体化发展过程中，辽金文学不是简单地向宋代文学靠拢看齐，而是能作出新的贡献。譬如，长期以来，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汉语文学，地域发展并不均衡。中原、巴蜀、江南等地区较为发达，华北一带相对薄弱。宋辽金时期，北方文化建设得到加强，宋室南迁后，中原文学中心遭到破坏，刘子翬说“南去人稀北去多”（《全宋诗》卷一九二〇《汴京纪事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4册，第21428页），虽未必很准确，但足以说明大批中原人口北迁，经过数十年的积累，北方人才越来越多，到了金末，刘祁惊讶地发现“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，今日合到北方也。”（《归潜志》卷一〇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18页）尤其是辽金佛教、全真教兴盛，印刷出版业繁荣，戏剧等通俗文学生机勃勃，涌现出一批文化重镇。华北地区虽然整体实力尚不及东南一带，但别具特色，大大夯实了北方文学的发展基础，初步实现了南北地域的均衡发展，改写了中华文学的地域布局。随着蒙古政权将大都确定为首都之后，北方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形成了稳定的、足以与南方相抗衡的北方文学中心。再比如，南北文风差异较大，“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”（《隋书》卷七六《文学传序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6册，第1730页），各有长短，唐王朝在统一之后，不失时机地取长补短，达到了刚柔兼济、文质彬彬的理想境地。但到了晚唐五代之际，六朝柔靡之风再次回潮，以温李新声、花间词为代表的晚唐五代文学，可谓儿女情长，风云气少。北宋时期，文人的心态进一步内敛，柔婉精美的长短句盛行不衰，直到女真人的铁骑打破了文人们的温柔美梦，才激起部分士人的斗志，但到了南宋临安不久，很多士大夫又迷失在江南秀美风光之中，如陈人杰《沁园春》词序中所谓“东南妩媚，雌了男儿”（《全宋词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册，第3079页）。所幸辛弃疾从济南投奔南宋，给南宋文学注入阳刚之气，力挽南宋文学柔弱不振的文风。在北方，游牧民族及北方汉人的强悍个性使得辽金文学充满阳刚之气。完颜亮《鹊桥仙》（持杯不饮）写中秋赏月，遭遇乌云，却写出了“愁眉怒目，星移斗转，懊恼剑锋不快”（洪迈《夷坚志·夷坚支志景》卷四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2册，第909页）等金刚怒目般的词句。刘昂《上平西》（蛩锋摇）为泰和南征助威，写得豪迈飞动，气势非凡；元好问诗歌“挟幽并之气”（《金史》卷一二六《元好问传》，第8册，第2742页），这些都代表了北方刚健文风。总体而言，宋辽金时期北方文学刚中有柔，南方文学柔中有刚，在一体化过程中，重塑了刚柔兼备的风格大局。

要之，宋辽金三代文学既多元并存，又具有一体性，特别是在融合北方民族文化方面，影响深远，为中华文学一体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〔作者简介〕胡传志，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。

（责任编辑 刘京臣）